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

语文第一册

词语表及例释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语文第一册

词语表及例释

北京六十四中语文组 编写
牛宝彤 主编 张寿康 校订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

语文第一册

词语表及例释

北京六丁四甲语文组 编写
李宝彤 主编 张寿康 校订

日用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阳路230)

甘肃省新华书店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64 印张：5.875 字数：116,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0

书号：9086·14 定价：0.27元

序 言

张寿康

解放前的国文教学，总的说来，没有什么计划性，更谈不到统一性。除开尽力探索国文教学问题的学者之外，一般地说，国文教师把教书看作谋生的手段。在教学中，真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为了谋生，当然总得有一套业务本领，不然，学生就会不上你的课（专门用语是“刷课”），或者用其他方式（比如学生用鼻子哼，教师也不知道是谁在哼）来表示抗议。这样，教师就只好离开这个学校，到别的学校教书或者再托人找别的事情做。

解放后，教师生活有了保证。在教学方面，拿北京地区来说，语文教师在党的领导下，有了统一的教材——陕甘宁边区编写的《中等国文》，也有了以区、片为单位的教学研究小组，开展了教学研究活动，定期研究研究教学计划、重点，这才开始有了点计划性。一九五〇年暑期，有关方

面举办了语文教学学习会，请叶圣陶、茅盾、吕叔湘、何其芳、邵荃麟等先生讲课，特别是叶圣老给教师示范讲了一首新诗，在讲解中显示了词语和修辞法在表达思想感情上的作用，对中学语文教师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全国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一套语文课本，这套课本大致按思想教育的内容组织单元，在思考·讨论·练习部分安排了一定的语文知识。总结《红领巾》教学以后，教学开始有了明确的教学目的。可是，这套教材还没有按语文教学的知识·练习·写作的系统来安排教材。也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考虑到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系统性。

五十年代初期（1954年暑期前）广大语文教师是十分努力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对语文教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当时的教育质量离党的要求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一九五四年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彭真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写出的。这个决定要求学生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受到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家长的拥护。当时党中央肯定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必要的，”并批转全国，参照执行。从实践的效果看，这个决定对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

《五四》决定公布之后，极大的激发了干部、教师的积极性。北京市委、教育局组织人力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邀请教师座谈，系统地调查有关教学质量的情况，反复进行研究。在《五四决定》中提出了编辑教学参考资料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当年七月开始展开，七月八日下午在中山公园北京市政协会议俱乐部召开了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编辑工作人员的首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翁独健同志主持，吴晗副市长讲话。吴晗同志对编辑工作十分重视，在会上谈了《五四决定》的意义和编辑参考资料的重要性。在这以后，彭真同志还会见了编委会所聘的顾问和各科编辑组的负责同志，对编辑同志提出了要求，并对在暑期工作表示了慰问之意。我曾参加了这次会见。

教学参考资料的具体编辑工作开始前，据我所知，语文编辑组对全市的语文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我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的语文教学情况与今天的语文教学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一是当时使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课

本，这套课本的编法与今天的统编课本有相同之点，即课文是大致按思想教育和文章体裁两条线来组织教材单元的。有的单元按思想内容编排，有的单元按文章体裁编排，没有严格的语文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课文后面也有一些思考·讨论·练习的题目。二是当时的语文教学质量不高，同今天的语文教学质量比起来，今天的语文教学质量还要更低些。当时我们首先从学生的语文成绩来检查语文教学的质量，“检查和研究了学生的日常作业，投考高中和高等学校的语文成绩和统一考试的成绩。”②检查研究的结果说明，学生的语文程度不高，“这表现在：学生的写作普遍存在着表达能力不强、文理不通、用词不当、语汇贫乏、错别字过多、字迹潦草、不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等现象。只有少数学生能在写作中运用已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分辨一篇作品的体裁，或者分析出一篇作品的主题思想。”③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分析了产生这种语文水平不高的种种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因素被忽视。我们过去在语文课中只形式地进行了文学教育和思想教育、不要求学生掌握已学过的语汇和语言的基本规律，不注意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和熟练技巧。语言知识和技能

技巧的培养，要求“说”、“听”、“读”、“写”并重，必须多做多种多样的作业练习，然后才能收得效果。可是我们过去的教学，却正是忽视了这些重要项目。另外的原因是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学也未能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与语言文学因素脱离，有外加的非语文的因素存在；对改进教学方法重视不够。”④鉴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在编写中学语文教学资料的时候，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加强语言教学。为了使·学生·获得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和训练他们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和熟练技巧，以提高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我们在授课计划纲要中提出正音、辨字的·教学，指出正确的字音，如‘盛chōng饭’等；指出哪些字是易错的，如‘假’易错成‘假’等；也指出哪些字是易混的，如‘绝’与‘决’等。以纠正学生在读写上错别字过多的现象。同时也加重了语汇教学的分量，从每一篇教材中·选出应掌握的词语和应理解的词语，并提出应分清的近义词和反义词来对照比较，如‘印象’、‘景象’、‘气象’和‘快乐’、‘痛苦’等；一些虚词特别是连接词如‘除非’、‘但是’、‘不但’、‘而且’等，也重点地提出来，以纠正学生语汇贫乏和用词不当的现象。另外，也加多

了训练使用语言、提高写作能力的作业练习，如朗读、复述、背诵、听写、改写，写提纲等共三十余种。”⑤一九五四年的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就是按这个主要原则编写的，广大的语文教师用了这套参考资料（12册，外有语法知识资料），反映是好的。教学效果有显著提高，相应地，高考的升学率也显著提高。入学考试的及格率普遍上升，一九五五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七（五四年为百分之三十四）。大家要求在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修改、补充、提高。因此一九五五年暑期，对这套资料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开始后，吴晗同志同语文编写组全体人员座谈。吴晗同志是明史专家，在会上很有风趣地谈到，明代虽编过一部永乐大典，这是宏伟的工作，但是比起大家所编的参考资料来则大为逊色。从实效的角度来看，大家的工作比起编永乐大典来意义就大多了。这一席话对大家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语文组的具体工作由市教育局副局长汪通祺同志负责，通祺同志同大家同吃同住，同我们一起奋战暑热，度寝忘食地进行工作（汪通祺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我非常怀念他）。我们坚持了加强语言教学的主要原则，为了进一步安排好每一课的字、词语的教学，我们委托中国

大辞典编纂处的同志，对十二册语文课本的应正音正字和应丰富的语汇进行了调查、统计，从每一篇教材中提出了一定数量的字、词语，做成卡片。这样集腋成裘，把字、词语的教学内容（另外也安排了句式的教学）落实到每一课的教学参考资料中去。我们进行了统筹安排，做到每课不重（个别重复的是在理解基础上复习巩固的）。这样十二册中，每一课进行的字、词语教学内容，系统化了，在现行语文教材的条件下加强了目的性、计划性和统一性，克服了盲目性。在字、词语教学中，不会产生少慢差费的现象，不致让学生在初一学了“顽强”，二年级还学“顽强”，可以一直“顽强”到高中去。可以让教师在字、词语的教学上心中有数，不浪费时间、精力，用来克服无效劳动的现象（这套资料曾由大众书店出版发行）。

实践证明，这种安排是比较科学的。字（正音、正字）、词语的教学，既照顾到教材的特点，也照顾到学生的年龄特征。对教学来说，效果也是好的，丰富了学生的语汇，加强了教学的计划性和教师的责任感，有利于进行教学检查，提高了学生字、词语的使用能力。一直到现在，不少老教师在谈起《五四决定》的有力措施时，认为

“是非常得人心的措施”，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他们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五四决定》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二年的实践，效果是显著的。”⑥

从目前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中坚力量来看，大学教师，优秀的中学教师、干部、医务工作者、工程师等年岁在四十岁上下的同志，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高中毕业的，他们的语文水平是较高的，有些同志（他们并不都是学文科的）写的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或志感的文字极好，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我个人接触的学生来看，这些学生有的在国外已经做了汉语文学教授，在国内的也作了大学讲师、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干部、编辑、医生和工程师，他们都是五十年代高中毕业的。语文程度是在中学打下的基础。这些事例，旨在说明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在《五四决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洪流中，学生是受惠不浅的。

到了一九五六年，教育部在几年前就进行准备工作的汉语文学分科的教学在全国全面开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的效果也很显著，不少当年的教师、学生在今天回忆起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来，都认为有收获。可惜汉语、文学分科的教学

还没有进行一轮，还没有到可以总结经验的地步就被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信口雌黄地扼杀了。

一九六三年，那时使用的课本，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课本相去不远。有不少关心语文教学的同志对语文教学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一九六三年五六月间，郑林曦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总题为《论语说文》的不少篇短文，谈到《少用难字》、《引用古书的方法》等问题，林曦同志还提出了编作文词典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北京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重视。汉语教研室准备接受建议编写一部作文词典。接着组织了编写的班子，由史振晔同志主管这件事（史振晔同志已在文化革命中不幸病逝）。我曾短时期参加过这一工作。为了编好《作文词典》，我们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准备工作，选条目，作词语用例卡片，调查中学生作文卷子，从中选取误例。《作文词典》计划收单词和成语约六千条，按音序排列。使用对象是高小、初中学生和同等文化程度的人。编写目的是帮助读者提高语文表达能力。读者可以从词典中查出常用词语的正确写法，查出常用词的词类和常用词语的意义及用法，以便消灭作文中的错别字，消灭用词不当，词不搭拢和语法错误等现象。毫无疑问，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对

中小学语文老师，对学生的好处极大。一九六五年一月《作文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印出样稿，征求教师、专家的意见。大家除对个别编写体例提了些意见外，基本上肯定了编写的目的和原则。这一工作进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有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传说《作文词典》的全部词语例句卡片都已散失，最近（五月间）才听汉语教研室的曹允中同志说，全部底稿和片卡都已找到，并准备组织班子，继续《作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听了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希望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编写出这部大家久已盼望的《作文词典》来，并希望早日问世。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这个会在进行中，曾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有几个人（包括一个研究汉语的人）在会上散布四人帮的极左观点，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⑦，要把皇帝、陛下、亲王、长者等所谓旧词从词典里赶出去。他们认为要解释“洋葱”也要加上“剥削阶级根焦、叶烂，心不死”这个尾巴，才算“突出政治”。明目张胆地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对词典工作的指示（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和六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对词书编

幕中的极左思潮、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总理指示：象陛下、殿下，怎么能不用？），但是四人帮这种荒谬的观点，受到与会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会上定出编写《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古汉语虚字用法字典》、《汉语谚语词典》、《汉语正字正音字典》等的计划。会后，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当时总理抱病工作，于八月二十一日在医院批审了这份报告⑧，我们希望语文工作者不辜负周总理的关怀，早日把这些词典、字典编写出来，以利于语文教学工作。

上文提到的《作文词典》和各种专门词典、字典，对语文教学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词典、字典的编写工作都不能代替各册语文教材的《词语表及例释》的编写工作，因为这一工作是直接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的。我觉得这种《词语表及例释》的编写工作，是1954——1955年教学参考资料中正字正音和编排词语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是符合《五四决定》的精神的，因此我十分赞助这一工作。在我们还没有经过广泛的调查工作、科学地定出的常用词语表的情况下，语文教材的词语表可以在丰富学生语汇，让学生正确使用字和词语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张志公、田小琳、黄成穗同志在《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见1978年《中国语文》第一期）中说：“设计出训练的途径、步骤和方法就能大大减少教学上的盲目性，减少浪费，提高效率。这就是科学化。”因此，张志公兄十分关心这部《词语表及例释》的编辑体例和实际编写工作。我也觉得编写《词语表及例释》工作在目前已有语文课本的情况下，是使字和词语教学科学化并加强计划性从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工作。

美国在六十年代初，首先推行的程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是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与教学目的，并考虑到学生的理解和学习心理特性与状态用预先编制好的程序（Program）来指导或控制学习某一学科（或它的某一单元）或某种技能的教学过程，用来保证在完成一个程序后达到对该学科和技能原规定的水平。这种程序教学可以缩短教学时间，提高学习质量，因此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相继推行^⑨。这种程序教学的电脑装置是七十年代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之一。程序教学对于语言教学是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可以程序化。编制程序教材是一件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国外大都是成立

一个专家与教师的小组来进行。我觉得，编制《词语表及例释》（按年級的词语形音义例释）能有效地进行字、词语教学，节省学生时间，也可以说《词语表及例释》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序教学的步骤和方法，应当说，这在字、词语的教学现代化方面，前进了一步。

中学语文课本《词语表及例释》的编制，给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词语教学，提供了参考材料。在进行词语教学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多年前的看法，即“在教学实践中，应当特别重视在句子和课文中来进行词汇教学”^⑩。如果进一步来说说道理，就是因为一方面词语的意义，只有在同上下文联系起来，在句子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另一方面只有启发学生认识句子中的词语的含义，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个词语在表达思想感情上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把语言因素和思想因素结合起来。这样做，我想比在教学之始把词语看作障碍，先加以扫除好得多。至于全课的字、词语的整理工作，则可以放在这一课的教学的最后阶段，同布置作业练习联系起来。这样也许更能让学生在脱离课文的基础上去理解词语的意义，不是让学生念词典。在使用这部《词语表及例释》时要引导学生着眼于在理解的基础上正确地

运用词语，切不可让学生死记硬背本书中对词条的解释。因为学生背了解释并不能就说明能正确地运用了。学生要在有指导的词语练习中学会正确地运用这些词语。

在进行词语教学时，应把重点放在词语在课文中的含义和词义辨析上，目的在于让学生准确地把握词义，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我们应当既反对教学中在词语的内容、意义上借题发挥，外加微言大义，背离进行词语教学的目的（如讲“日理万机”时，大讲周总理的故事和革命精神）；也反对在词语的解释上，搞烦琐考证，罗列词语的多种意义（特别是一词多义）给学生讲词典。这种做法都不利于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应当认为这是浪费教学时间的作法。这部《词语表及例释》中所列的义项和例句有的不是课文中词语所显示的意义，这些都是仅供教师参考的，准备回答部分学生进一步探讨时所提出的问题的，不必完全教给学生。

正字、正音和词义辨析的教学内容，可以在课堂内进行（比如做课堂作业练习，但也不限定只是用练习的方式），也可以安排课外进行，让学生做一定数量的巩固性练习。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很注意正字、正音和词语的教学，但是在安排